地方社会

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
——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

衷海燕

[**摘要**] 本文通过对江西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探讨清代乡绅的宗族组织、学术传承与地方权力体系的建构过程，揭示清代基层社会结构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趋势。

[**关键词**] 江西　乡绅　望族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3) - 02 - 0062 - 07

Rural Gentry, Prominent Families, and Local Society in Jiangxi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Zhongtian Town, Xincheng County

This essay examines Zhongtian Town, Xincheng County in Jiangxi province to explore the clan organizations of rural gentry, their scholarly traditions, and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y established their local power. From this case study it is easy to see changes in the system of local power at the lower levels of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美国学者艾尔曼在关于清代常州今文学派的研究中，揭示了经学、政治与宗族之间的内在联系①。其研究主要集中于江南士绅借助于宗族组织追求学术声望，扩大其政治影响力，而对其在地方社会的活动则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江西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探讨清代乡绅的宗族组织、学术传承与地方权力体系的建构过程。

一、中田镇的地域环境

新城县（即今黎川县）位于江西省东部，地处闽赣两省交界地带，东邻福建省光泽县、邵武县，南毗福建省泰宁、建宁县，西接本省南丰县，北与本省南城县、资溪县相连。源起武夷山西麓的抚河水系流经境内，其中主要河流为黎滩河（中川）、龙安河（西川）、资福河（东川）。南宋绍兴八年（1138），始析南城县东南五乡设新城县，因黎滩河贯穿全境，故别称黎川。宋元时期先后隶属建昌军、建昌府，明清时期隶属建昌府。民国三年（1914），因全国有四个新城县，为避免重名，故改江西新城县为黎川县。

清康熙时，中田镇为新城县十大市镇之一，位于新城县西北部，与江西南丰县相邻。据说，当地始因周围数小村落环绕，居中为田，故名“中田”。②在行政建制上，中田属新城县十九都，其名称曾几度发生变更。明代称为“中溪”③，至清初逐渐发展为镇市，随之称为“中溪镇”(钟溪镇)，又称“钟田镇”④。乾隆以后，人们又称之为“钟贤镇”，如乾隆、同治两修《新城县志》中皆有“中溪，后名钟

[**收稿日期**] 2002 - 10 - 15
[**作者简介**] 衷海燕（1975 —），女，厦门大学历史系 2000 级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贤”的记载。

清康熙年间，新城县共有七镇三市，中田即为七镇之一。据康熙县志记载：“中溪镇：皇清初，兵马驻匝县城，商贾往来，悉集于此，遂成大市”。至乾隆朝，中田户数已达到一千四百余户[5]，逐渐发展成为新城县的一大重镇，为附近坊都的商品集散中心。如新城十八都的“日用之所需，竹木陶植、畚钟釜甑、醯醢盐酱之属，皆资给于”中田镇，“贫者朝负薪而来，夕易米以归，乃得食”。[6]直至清末，中田依然是新城县农村集市贸易的中心。民国时，中田为新城县所仅存的二镇之一，另一镇为龙安镇。

市镇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促成了科举的兴盛。清乾隆以后，中田科举极盛，考中进士的人数居全县首位，故誉称“钟贤”（详见后述）。在当时，中田镇号称“小苏州”，声名越过县城，“时人只知有中田，不知有新城也”。[7]

二、中田镇的两大望族

清代中期，中田镇的主要居民为鲁氏和陈氏两大家族。故老相传，中田很早就已有王姓、邓姓等居住，但人数稀少，鲁氏为中田最早兴起的大族。据鲁氏族人鲁九皋记载：“（中田）鲁氏自宋循吏有开之子孙，由江南亳州迁居江西之南丰，其后有曰佐文者，复由南丰迁居新城之中田里。于是新城之中田有鲁氏。鲁氏之处中田，世读书，敦礼让。洎明之中晚，历时既久，族渐繁，士遂多，有声庠序间。其出而仕者，忠义之节，德业之著，皆卓然有以自立。入国朝而益显科第仕宦属”。[8]在当地历史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中田鲁氏的记载。如云：“中田鲁氏，号称富盛，礼让自将，颇为美俗”[9]；“中溪鲁氏，文学尤著”[10]；“十九都峰峦耸秀，中有石坛，多灵迹焉。中溪后名钟贤，鲁姓文学尤著”。[11]

明清之际，中田鲁氏经历了由富而贵的历史转折。同治《新城县志》记载，鲁氏族人从明末开始在科举上崭露头角，清代在科举上日益显要，渐居于新城县首位。终清一代，中田鲁氏一门共出 17 名进士，占全县清代进士总数的 1/5，其中康乾时期进士为 12 位，因而也就成为新城县著姓、地方上的望族。康熙四十七年（1708），新城县乡贤祠中开始列祀鲁氏士绅，分别为鲁论（字孔璧，号西麓）、鲁训（鲁论弟）、鲁毓圣（字孕文，号澹庵）、鲁启圣（毓圣弟）。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又增祀鲁瑗（字建玉，号留耕，又称西村先生）。清代新城乡贤祠中共列祀 35 人，鲁氏占据了 5 位，可见其地位之显要。

自明末以降，鲁氏作为地方望族，在本地文人的笔下已是“美俗”的象征。万历年间编撰的《江西新城保甲图册》，对中田所在的十九都有如下描述：

> 十九都东南去县三十里。水从楼灵山出中田，至港口，达于黎川。楼灵山高二十余丈、周迴三里，峰峦耸秀，中有石坛，多灵迹焉。山南三里之间，水流九折，故称九曲。都中独中田鲁氏，号称富盛，礼让自将，颇为美俗。焦源、澄溪亦复稠聚饶给。至李源、中溪、涂溪、井水、杨塘诸处则稍稍寥落矣。西洲民皆食贫。北门渡剽悍好争，穿窬多有，风是用偷，化以柔和，息奸止盗，固当预矣。[12]

清中叶与鲁氏并驾齐驱的中田陈氏，大约在清顺、康年间始迁居中田。据载，陈氏“先代自宋进士孔明，籍江西之新城，居县治”[13]。自孔明传至二十四代，生以汧。以汧字西岐，因对清初“士习浮嚣”不满，“独结茅山间，闾修笃行”。[14]由于沉醉于钻研经学，不治生产，以致先世留下的产业逐渐耗空，家道衰落，于是“析诸子异居”。以汧五子分别自谋生路，其中陈世爵（1682—1752，字浣修，号立轩）一支移居于“西乡钟贤里”，即中田。据说，陈氏祖上曾居于十九都焦原乡，邻近中田。如云：“余家先世居大坑，祖墓在探科岭，皆焦原之村落也。其后徙居城内，复自城内而迁中田，则为十九都之人矣。”[15]此外，陈世爵及其祖父所娶妻室，皆为鲁氏后裔，所以陈、鲁二族早已有渊源关系，世爵迁居中田可能也主要是依靠姻亲关系而得以立足。

陈世爵到中田后不久，即弃儒经商，从事竹木生意。新城位于山区，竹木为其特产之一，加上龙安河从中田穿过，可直达抚河，再到鄱阳湖而入长江，水上交通十分便利，竹木

贸易为当地的传统商业行当。经商之初，“执业甚微，而以信义待人，人敬服之”[16]。此后，逐渐扩大经营范围，“贸迁于吴、楚、闽、越、燕、齐、赵、魏诸镇地。水陆奔驰，岁无宁处”。其为人处事，颇具儒商特色，“性刚果，遇事即行，无留滞。与人期，无宿诺，虽甚风雨，必往践之。四方人士，数千里外，虽千万金，但得府君一言，遂为左券……与人交，朴直简谅，词色端严，若难忤者，而器量阔达。时或受人欺侮，始不免愤懑，终能宁耐抑志”。[17]新城地方志记载了陈世爵在木材集散地吴城镇的经商过程：

> 昔贾吴城，归，舟覆，尽没其资。念皆受人所付托，归，无以见人，独行湖畔，欲投水死者数矣。既而自念奈何为匹夫之谅，遂步泥淖中百二十里，归与与金者约曰：“吾不幸罹此，必悉家所有以偿不足，以庸终之。”皆曰：“君岂欺人者?”复假以数千金，俾再往。获得数倍，尽偿前所负而加赢焉。[18]

陈世爵在经商路上，历经艰辛，励精图治，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成为一方富商巨贾。然而，其独子陈道（1707—1760 年，字绍洙，号凝斋）并未子承父业，而是专事举业。乾隆十三年（1748），陈道中进士后，以父母年事已高、无同胞兄弟为由，未去任官。此后诏举明经，也被他辞拒。陈道最终虽未走上仕途，但由于他随其父在中田兴办慈善事业，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对陈氏在中田迅速兴起，跃居当地望族起了极大的作用。自陈道以后，陈氏家道渐盛，人丁兴旺，大批子弟获取科举功名，并成为达官显贵。民国《江西通志》记载：“清进士陈道，子守中、守誉，乾隆年间同举乡试，孙观、用光、椿冠，曾孙希祖、希曾、兰祥，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

鲁、陈两族皆为地域性大族，同居于中田，于是两家结为世代姻亲，建立起地域婚姻圈，形成了稳定的家族联盟。陈道曾经写道：“陈、鲁于中田为著姓，陈氏之兴后鲁氏，而世为婚姻。”[19]陈氏自迁居中田的第三代，即陈道的全部五个儿子，皆与鲁氏结为姻亲。此后，陈氏子孙中与鲁氏通婚的也占多数。如陈道之子陈守中一支，因主要乡居于中田，其子多与鲁氏通婚。[20]鲁、陈二姓以婚姻网络为家族联盟，无疑有助于建构地方权力体系，对社区生活实行有效的控制。

三、中田镇的桐城派学者

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之一。中田的士绅与桐城派学者渊源甚深，受其影响也最大，并积极参与其学术思想的传播，由此使中田成为清代桐城派学者集中分布的三大区域之一。这三大区域分别为苏南浙北、闽赣交界与河北平原[21]，其中的闽赣交界地带即包括中田镇在内。据周振鹤等先生研究，这些密集分布点的形成有一个共同特点：“宗师在本籍以及本籍周围的相当一片区域内（如本府州县乃至本省）所具有的深远影响及其一传再传乃至三、四传，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门人、私淑的地理分布格局。”[22]

桐城派的闽赣边界分布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位桐城派宗师：福建建宁人朱仕琇（乾隆十三年进士）及江西新城中田人鲁九皋。鲁九皋（1732—1794），原名鲁仕骥，字洁非，号乐庐，因其书室额文“山木居士”，人又称为山木先生。乾隆三十年拔贡，三十五年中恩科乡举，次年（1771 年）成进士。后家居奉养双亲达十余年，始出选山西夏县知县。任职间，廉洁谦和，轻徭禁贪，事必躬亲，卒于任所。鲁九皋少年受业于新城中田理学家陈道（凝斋）。在桐城派古文风靡之时，九皋又趋谒福建建宁学者朱仕琇学习古文作法，也曾师事雷鋐（雍正十一年进士，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师事方苞），又与仕琇弟子建宁人李大儒交往十余年。他与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交往甚密，受影响颇深。姚鼐在为鲁九皋所作的墓志铭中写道：“观其言动，恭饬有礼，而知其学之道；读其文，冲夷和易而有体，亦知必为君子。新城古文之学日盛，其源自君也。”[23]

鲁九皋回到中田后，即积极推行桐城派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以其文学授之于弟及乡隽才”。在江西的 73 位桐城派学者中，鲁九皋的门人、私淑共 27 人，占 37%。其中 24 人为新城本地人，包括鲁氏的族内子弟、亲族子弟

(即中田陈氏）以及乡人等，皆得九皋亲传。[24]在九皋的影响下，新城县与南丰县及福建的建宁、光泽、宁化五地，文风相师，共出古文作家 107 人，堪称南方的桐城派古文中心。继九皋之后，陈用光又成为新城桐城派的重要代表人物[25]。陈直接受业于姚鼐，与桐城四杰的梅曾亮、管同交情甚厚。

桐城派受唐宋古文运动影响极深，崇理学、尚科举，为宋明理学的传播提供了系统网络和学术资源，并因此在 19 世纪为世瞩目。新城县在桐城派的影响下，科举盛极一时，终清一代共有 85 名进士，远远超出明代（22 位进士）。在江西各县进士人数的排名中，也由明代的第 27 位而跃居清代的第 6 位。[26]其中，中田镇的进士人数约占 28.2 %，清代共有 17 名鲁氏族人、7 名陈氏族人中进士，另有 48 名鲁、陈二氏族人中举人。

宗族社会与经济势力不仅与科举考试的成功有密切关系，而且与地方文化资源的控制息息相关。科举考试的成功十分有利于获取宗族以外的政治、经济权利和资源。较多的受教育机会同时也保证了族内的富有成员拥有比较多的管理宗族事务及地方事务的知识和机会。

四、士绅、宗族与地方事务

中田镇的鲁、陈二姓士绅，在利用宗族组织追求学术声望与科举功名的同时，也积极介入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建构对于地方社会的支配权。

修建桥梁：中田镇的永济桥与钟贤桥，为当地的主要交通设施，清代皆由鲁、陈二姓士绅主持修建。

永济桥，旧名钟溪桥，明代由鲁氏修建，明末毁坏。雍正五年（1727），中田乡民议修永济桥，鲁氏难以独力承担，遂与陈氏合办此事。据记载："先是众议敛钱公建，辄言采买山木需时，皆敛手疑惧。"[27]陈氏此时迁至中田不久，陈世爵又以经营木竹生意致富，也希望趁此机会介入地方公共事务，于是与鲁氏商议合作修桥，鲁氏最终答应"共襄之"。陈世爵"徒步相度山木，周行三百余里"，[28]终于将所需梁木购齐。这是鲁、陈二姓共同承办地方公共事务的开端。

由于永济桥作为木桥不能经久，"率十余年一易"，清代鲁、陈二氏多次组织修治该桥，并捐田护桥。如乾隆三年，鲁朝简（1679—1758，附贡，湘乡县知县）捐资倡修。乾隆十五年（1750），陈世爵独力修建永济桥。此时，陈氏经济实力逐渐增强，加上陈道已考中进士，社会地位大为提升，其修桥之举得到了鲁氏族人的认可。在陈氏修桥之后，鲁氏族人纷纷"敛捐租田，岁积其入，为修葺改建之储"[29]。此后，在乾隆甲午年（1774），鲁肇修亦令其子独任修建永济桥。[30]

钟贤桥是在陈氏迁居中田之后，由陈氏族人新建的。乾隆二十九年（1764），曾任浙江金衢严道的陈道长子守诚（字伯常，号恕堂）认为，永济桥为木桥不能经久，而中田自成为市镇以来，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单靠永济桥无力承载，于是决定出资另建一石桥。他与中田各族乡绅商议之后，"里之长老、贤士大夫召石工而相度焉，佥曰可为，乃诹吉日，伐石起工。"[31]不料，桥未建成，陈守诚即已病逝，乃由其弟守诒接任此事。桥建成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命名为"钟贤桥"，共花费"白金万两有奇"。[32]此后，陈氏又多次重修钟贤桥。道光年间，中田居民集资重修钟贤桥，推举陈守诒之孙兰祥（字伯芝，道光九年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主持此事。竣工后，建亭于桥中，两旁护以石栏，名为"钟贤桥亭"。咸丰年间，桥因战乱被毁。同治庚午（1870），陈氏族人谦恩（例监，署福州府知府）又独资修建钟贤桥。

创立会馆：为了便于新城举子赴京应试，陈氏族人曾专门在京师创立会馆，即"黎川新馆"，又称"京都西馆"。称"西馆"或"新馆"，是因为在陈氏建会馆之前，新城人已经在京师建有会馆。该会馆位于正阳门之东，为明嘉靖间司空张[illegible]创建，清国学生黄世祚于康熙十七年重建。[33]陈氏所建会馆位于正阳门之西，故称为"西馆"。会馆用地为陈守诒所购，位于三眼井。守诒归乡后，会馆除供给族人使用外，对在京新城士人都是开放的，如"吉州知州喻心筠宝忠、前鄢城县令黄仰岱奕瑞，皆居是馆，成进士。"[34]此后，陈守诒又与弟守中

将所购宅交换，于是西馆搬至椿树头条胡同。乾隆二十八年（1763），守诒之子用光重新修葺会馆，以其后宅居本县举子，将前宅出租给一山西商人居住，以六年为期，“而资其僦直以修其前宅”。凡修治之费为银 900 两，6 年后馆成。[35]为了使会馆能更好的管理，陈守诒与邑人协商制订了“新城京都西会馆条例”:

> 一、会馆原以为公车读书之所，若商贾闲杂人等混居，必至有妨静业。候补、候选人员必自七品以上方可入馆居住，每月每间量出资五钱为修葺费。至恩、拔、副、岁、优、监来京朝考及乡试亦例得居住，惟会试之年均宜让出。
>
> 一、会馆必需人经理，有官京师者则京官主之，否则佥一公车留京者主之。凡邑人来京者到门，长班必须告知经理，如系条例内不应住之人，经理必须大破情面，邀同在京绅士阻止。
>
> 一、公车初中者出喜资四两，进士出喜资八两，至选官喜资均照定例。
>
> 一、房屋必须整齐修饰，凡寓馆者窗户门壁均宜顾惜，毋至损伤，房屋稍有渗漏，即宜不时修葺。
>
> 一、家伙什物须同长班不时稽查，凡有搬移他往者，惟经理人是问。
>
> 一、看管长班必择稳妥者令启闭门户，每月给饭食五钱，稍不安静者逐出。
>
> 一、居馆中皆读书君子，自知安分守己，但恐少年风流，或酗酒、挟妓、赌钱、口角，则大为白圭之玷。倘有似此者，幸毋入此室也。[36]

从上述条例中可以看出，陈氏通过建立会馆，强化了新城士绅阶层的地域凝聚力，同时也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

赈灾建仓：中田地处河谷地带，水灾频繁发生。鲁、陈作为地方大族，常在荒年进行赈灾救荒活动。如康熙丁丑（1697）、甲申（1704），先后岁饥，鲁氏三兄弟时贵“出谷数百石发赈”，时凤“煮粥救饥，以待四方来者”，时凰也“出谷赈饥”。乾隆甲辰（1784）岁荒，义士鲁廷才买谷千余石，碾米减价平粜。[37]

陈氏家族约在乾隆以后逐渐介入当地救灾事务。乾隆七年（1742），中田发生大水灾，在南昌经商的陈世爵闻讯后，立即在南昌买谷四千余石，准备救济乡人。此时正值其子陈道自京师归省，世爵于是命陈道在中田平粜，并嘱咐道：

> 乡里苦饥，我幸有余力，义当劝分推解。事则难继，计惟平粜善。然度今所收贮并家仓存蓄，仅支吾乡三月粮，万一购买不续，外贩裹足，使市中无米，则此举非惟无益，适以害之。汝还乡，其与长者熟筹之，设施措注必详必均，毋执、毋徇、毋忽、毋矜，终始如一，斯可以济。

陈道于是奉父命运粮返乡平粜，以编户计口方法救饥，“丁口写清门户牌，每家每日需米若干，注于牌”。至第二年春夏之交，仍然减市价三分之一进行平粜。乡人只要持门户牌来，则按数给粜，“不争不扰，民无守候之苦”。但至“夏五暨闰月，市价日腾，视减值且倍，远近争趋赴籴”[38]。陈世爵闻信后，立即又从南昌运来大量豆麦等杂粮以代匮，终于使中田渡过了此次难关。通志记载：“桀黠者得食，亦驯服，远近赖以安，自是值歉岁踵行之”。[39]这是陈氏经商致富后在中田首次倡办的慈善事业，前后运粮达六千余石。此后，陈氏即于家中藏谷三千石，平时“视年岁之丰耗、里谷之多寡，时价之低昂，倏粜倏止，与时消息，岁饥则仍发而平粜”，如此长达 30 余年。[40]

除赈灾救荒外，鲁、陈二族还先后建立社仓和义仓，以备不时之需。乾隆七年，江西巡抚陈宏谋颁行“社仓条约”，其中规定：“社谷或按都或按里，择适中之地存储，每年听该都、里农民赴社长副领借，秋后每石加息一斗还仓。不同都里之民，不得搀越争借。”在管理办法上，规定由“社长副经管社谷”，但官员仍对社仓有监控权，如云：“岁底还仓之后，地方官减从往查一次。”[41]

中田鲁、陈二氏的仓储建设过程，经历了由社仓向义仓的过渡。乾隆四年（1739），鲁鼎梅（字调元）承其父命，在中田倡捐并营建钟贤社仓，“积谷六百余石，春散秋敛如法，乡人德之”。[42]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鲁鼎梅自台湾鹿门同知任上还乡，又再次扩建钟贤

社仓，储谷达 700 余石，并立“社约”，春散秋敛以为常。鲁氏除倡建社仓以惠中田诸姓外，又建族田以“敬宗收族”，并最终由族田而发展为义仓。

鲁氏赡族义田之设，始自于乾隆初年的著名乡绅鲁九皋。鲁九皋为乡居进士，因积极从事地方公益事务，而在中田享有较高声望。乡里有疑义纷争，多向他请教或请他调解处理，致使三十余年间，钟贤礼义之风盛极一方。[43]乾隆年间，知县李任庭力行保甲法，亦曾两度委任鲁九皋参与推行保甲法并编查中田里甲户口。[44]鲁九皋家居期间，为倡建族田以赡族人，“乃致书于孟县知县从叔鸿及沂州知州族叔潢、吏部考功司员外从弟兰枝，各出资财以成之”。并选荐办事公正且能力强的族人经管，“岁有增益，行之数十年”。[45]乾隆三十九年（1774），鲁氏决定结合先贤邓元锡及范氏义庄的建仓方式，将族田发展为义仓。倡首鲁翥与弟凌云、西白“出谷百石于家庙为前驱，后捐者量力踊跃”，共得谷 700 多石，命名为“鲁氏家庙义仓”。此仓为鲁氏所建，但其受益范围并不仅限于本族，而是扩及全中田，因此里人匾鲁氏庙门曰“乡闾食德”。[46]

在鲁氏建立族田、义仓的同时，陈氏建立了更大规模的义田和义仓。陈氏义仓的兴建，直接导源于陈氏义田。最初，陈世爵去世后，其子陈道依其遗言，“以租田二千石赡宗族，定规约，依范氏义庄法”，[47]置田 2000 石作为其祭田，除供祭所需外则用于资助族中贫困者。至乾隆二十五年，陈道去世，其长子守诚又立 2000 石作为陈道祭田，另因“慕古者联属五服之义”，再立 2000 石作为小宗义田，由世爵嫡支子孙世世经理。[48]乾隆三十年，陈守诚因病去世，其弟守诒闻讣归，出于对长兄的敬意，决定将 2000 石“小宗义田”作为守诚祭田，由其后代子孙轮值经理。因此，中田陈氏在三代之内，先后以“祭田”设立了 6000 石族田。乾隆三十七年（1772），陈守诚四子陈元、奉宽、允泰、观又与守诒商量，认为世爵祭田“自供祀事而外，所余之数不能增长”，长久下去难以供“族人之繁盛”，于是决定把其父守诚的祭田充作义田，由全体族人共同经理。[49]不久之后，陈元兄弟又以此义田为基础，进一步创设义仓，最后建仓于立轩公（陈世爵）家庙之前，即为陈氏义仓。其规模宏大，为仓即有十四，“缭以周垣”，其外垣纵横达十余丈，内为曝晾稻谷园场。[50]该义仓为陈氏家族义仓，受益者也多为家族内部成员。

乾隆四十年（1775），陈、鲁二族联合创立了中田规模最巨的义庄——广仁庄。先是，陈守诒与鲁九皋商议，决定将乾隆八年以来陈氏所藏的救荒谷 3000 石“推而公诸里中”，建立一仓，“使里中无告之民有所依，里中公事亦有所取资”。[51]九皋对此举极为赞同，并出面劝捐里中各姓输资，以作为建仓费。在他的倡导下，“乡人相率捐谷，易金千余两”，共建一仓，命名为“广仁庄”。陈氏家族在所捐 3000 石存谷之外，“陈守诚长子、光禄寺卿元偕其叔守诒、守中、守誉共捐租 400 石，正岁收其谷以护仓”，而在山东任官的陈守训得知此事后，也捐谷 1000 石同储仓内。[52]

广仁庄与上述鲁氏家庙义仓、陈氏义仓不同，并非是一家一族所建的家族义仓，而是由中田镇各姓协调建立的乡族义仓。广仁庄建立后，对中田的社区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是社区性的救灾机构和粮食储备系统，而且广泛资助各种慈善事业与公共事务，如照顾鳏寡孤独、贫民及管理山林、禁止私宰、实施保甲法等，对社区生活实行了全面的干预，因而也是当地的社区权力中心。广仁庄的创立及其运作过程，集中地反映了中田乡绅与望族的社会控制模式。[53]

结　语

明清之际，随着地方贸易的发展与科举的兴盛，地处边陲的中田逐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礼仪之邦。清代中田的鲁、陈二姓乡绅，不仅拥有高级科举功名，而且作为桐城学派的杰出代表，拥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他们在获得科举功名与学术声望之后，大多长期隐居于乡里，致力于文教事业与家乡建设，对地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中田的鲁、陈二族，都是既富且贵的地方望族。他们通过修族谱、建家庙、设义田等，建立了严密的宗族组织，同时通过二族之间的世代联姻，形成了稳定的

家族联盟，共同对地方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清代中田乡绅与望族控制地方社会的主要途径，是通过修建桥梁、创立会馆、举办赈灾活动、建立仓储制度等方式，全面接管地方公共事务，确立了对社区生活的支配权。通过对清代中田镇鲁、陈二族的个案分析，我们既可以揭示乡绅的宗族组织、学术传承与地方支配权的内在联系，也不难看出清代基层社会结构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趋势。

①(美) 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黎川县地名志》第 34 页，1987 年。

③正德《新城县志》坊都。

④⑩康熙《新城县志》坊都。

⑤鲁九皋《中田保甲图说》，载《同治新城县志》保甲。鲁九皋曾两次编查中田户口，第一次为一千四百余户，第二次为一千三百余户。

⑥鲁九皋《十八都义仓记》，《山木居士外集》，乾隆四十七年刊本。

⑦转引自抚州地委统战编委会《黎川幽栖寺》，《赣东寺庙》，1997 年 9 月。

⑧鲁九皋《河南永宁知县鲁在田墓志铭》，《山木居士外集》。

⑨⑫㊹明赵日崇撰，清杨希闵校刊《十九都论》，《江西新城保甲图册》(万历本)。

⑪㉙㉚㉛㉜㉟㊱㊾同治《新城县志》卷二。

⑬涂南池《陈凝斋先生墓志铭》，《南池类稿》，道光间刊本。

⑭乾隆《新城县志》人物志 ·先正。

⑮㊻㊽㊿52同治《新城县志》卷三，仓储。

⑯⑱㊲㊷同治《新城县志》卷十，人物志。

⑰⑲㊳陈道《显考立轩府君行状》，《凝斋先生遗集》卷一，嘉庆四年刊本。

⑳详见衷海燕《清代江西义仓与社会变迁——以新城县为例》，江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㉑㉒㉔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第 211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㉓姚鼐《夏县知县新城鲁君墓志铭》，《惜抱轩集》文十三。

㉕陈用光（1768 - 1835），字硕士，一字实思。嘉庆五年（1800）中举，次年（1801）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道光二年（1822）提升司业，历任中允侍讲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右侍郎、代理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还先后担任过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直阁事、国史馆纂修总纂、文颖馆明鉴总纂、乡会试同考官、河南乡试正考官、江南乡试正考官、提督福建学政、浙江学政、壬辰科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武会试总裁等职。

㉖谢宏维：《论明清时期江西进士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 33 卷，2000 年第 4 期。

㉗㉘陈道《显考府君墓志铭》，《凝斋先生遗集》。

㉝㉞陈用光《重修黎川新馆记》，《太乙舟文集》。

㊴㊼光绪《江西通志》卷一百五十六，列传。

㊵51鲁九皋：《广仁庄条规》，《山木居士外集》。

㊶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八，经政略 ·仓储。

㊸《黎川县志》，黄山书社 1993 年。

㊺鲁九皋《寄厚畲先生书》，《山木居士外集》。

53详见衷海燕《清代江西的家族、乡绅与义仓——新城县广仁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2002 年第 4 期。